

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编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 任 赵 金

副主任 宣宇才 蔡春生 黄 尧

编 委 刘 荣 王 岭 范建华 李 维

林文勋 杨林兴 陈友康 杨正权

张 勇 张昌山 林超民 余嘉华

谢本书 吴宝璋 李继红 杨安兴

刘大伟 李银和 赵石定 周 祥

王建南 张平慧

总 序

丛书编委会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中华文明自滥觞至汇聚千流，涵纳万水，奔腾迭起，云蒸霞蔚，延五千年之长史，至今生机勃勃然，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保持完整且衍传有序、光耀于人类的伟大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兴国之魂，强国之魂。

云南，是祖国西南神奇、美丽、富饶的宝地，是中华文明中极具特质和创造潜力的丰美之乡。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瑰宝。长期以来，云南大地上，各民族和睦与共，相濡相生，共同创造了色彩瑰丽、形态

多元、底蕴厚重、影响深远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遗产。人，是历史的镜子，是历史最生动的环节，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和创造主体。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一个个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产生过一些不同的影响。“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就是这样一丛历史的记录，一百位历史名人，虽未必尽能概全，各位历史人物的代表性也不尽相同，但都是“追梦人”，是振兴民族伟大理想的传薪人、探索者和实践家。

在这些代表人物中，无论是拓土开疆的将帅勇者，还是蹈海酬志的大国使节；无论是志于传播文明的鸿儒巨擘、先哲贤士，还是为民族独立解放而高歌猛进、慷慨捐躯的群雄英杰，都贯注了这一重要精神。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云南各族人民创造并抒写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章，熔铸了坚韧不拔、奋为人先、包容博大、敢于担当的精神品质，才使云南在中华文明的长史中闪耀着特有的光辉。尤在近代中国，在辛亥护国风云中，在反对外辱保卫祖国边疆维护民族尊严、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中，云南站在历史前台，以中华群雄的不屈身影演出了一幕幕豪迈悲壮的历史大戏，也更涌现了一批足以彪炳史册、光照后人的杰出人物。这一切，给予中国历史进程深远的影响。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谱写富民强滇中国梦的云南篇章，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重要条件，这就需要接续这一光荣而伟大的精神传统，在继承中创新，

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超越。云南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聚合更强大的精神动力，为推动我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凝心聚力。为此，我们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编写出版了“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这对加强我省各族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历史的了解、认同，爱国爱乡爱民并甘于奉献，对提升优秀精神品质，形成团结奋斗的共有的思想基础，坚定推进富民强滇的信心和决心，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切实的助力。

一百位历史人物，所处历史时期并不相同，其历史作用也有差异，甚至就个人的全面历史评断方面也难以等量趋同。但我们以为这些留存于史籍的人物，所以传扬至今，为后世崇奉，均有他们共同的历史向度和价值取向，我们学习这些历史人物，至少应当着重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即：“守大德、重大义、集大成、有大度、达大观”。

守大德，即恪守道德规范。“德者，本也。”（《礼记·大学》）“大德”既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及标准。古语“行德则兴，背德则崩”，不仅是资政经验，也是个人修习完善的根基。所谓“厚德载物”，直观的理解，就是如果德行浅薄，是不能兴物成事，更不能造就伟大功业的。云南历史文化名人，大多以德立身，大节不移，并对此恪守坚定，一以贯之；始终保持正确信念和理想，并为之奋斗到底。这是我

们首先要学习尊崇的。

重大义，即以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为个人行为取舍的标准。有大义，才有大爱。这些先贤无不爱云南爱乡土，以兴业乡梓、造福一方为己任。尤在国家民族命运攸关、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些令人崇敬的先辈，大义擎天，逢难不避，敢于担当，责无旁贷，勇往直前，不惧牺牲。一个心存天下大公的人总会在不经意的一瞬决定大义的选择，这是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更何况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有很多异常艰危的事业在等待我们去克难攻坚。所以，举凡大义、为民为国、全身而进的精神是我们应当效法崇尚的。

集大成，“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些历史人物留下的足迹，予人深刻启迪。他们无论是出将入相，还是布衣一袭，均勤学不辍，求索不止，在追求真理和知识的道路上刻苦务实，义无反顾，永无终期，故能成大器，胜大任，不辱使命。今天，世界进入知识信息时代，软硬实力决定一个国家能否赢得发展机遇，乃至自立于强国之列的地位。其紧迫性不亚于先辈梦想中国富强的百年期许。但今天所谓“集大成”，是更高更大更具有生存挑战性和发展战略性的，是集世界之“大成”，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制度建设、社会发展等一切领域“总成”，玉成中国梦的空前伟大的事业。所以，先人刻苦自律、博学精进的学习精神我们应当秉持继承。

有大度，即要有开放包容的胸怀。云南历史文化名人的一个共通品质，也是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即使身处僻远，总能破除狭隘与陋见，以宏大度量，兼容并包，接纳先进，吸收优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聚合一切可以聚合的资源，总成一股创造历史的宏大动力，来完成伟大的事业。哪怕是割股舍己，也在所不惜。今天，云南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保持开放包容的胸怀尤其重要。所以，先辈“天下云南”的大度我们应当弘扬光大。

达大观，即要眼观天下，达察全局，与时俱进，审时知变，敢为人先。推动云南社会历史进步的代表人物，无不目光远大，胸怀全局，对世界潮流、时代嬗变，都能审视洞悉，并欣然顺应规律，故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做出正确选择，成就改天换地的一番伟业。古语有“小智自私”“达人大观”，是将为个人谋私的小智谋与担当天下兴亡的大智慧尖锐对比而言的。否则，“兴也忽焉”。一个为民为国而应用心智的人，必然有达观天下的心怀，也由此激发潜能、超迈寻常，而使人生境界也更加美好而宏丽。遍观世界文明史，许多影响人类进步的伟大创新，正是以此为动力和起点的。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日益强大，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也为个人实现自身价值创造着更加富实的前景。所以，先辈们达观天下的精神我们应当引为楷模。

我们对志向高远、仰观天下、俯察民情、甘为路石、慨当以慷、求真务实的历史名人，心存景仰，并愿与千千万万的读者，尤其是青年朋友一道学习弘扬。

组织编撰“云南百位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工程，编撰出版人员都做出了艰苦的努力，但由于众手修书，书稿层次不一，成书体例难以做到完全一致，对存在的不足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虚心接受，并在修订再版时一并吸纳修改完善。

《名儒总督》卷首语

在省外，他誉满天下，朝廷表彰，省民请奏为之立专祠，士林奉之为山斗，所谓“三朝元老、九省疆臣”“学术护法神”……

在省内，人们认同他有嘉德懿行，无查劣迹，却鲜知其入其事，与我们渐行渐远，留下一个令我们哈哈一笑的诨号“阮烟袋”，留下一个不伦不类的形象“不通”之人……

其实，阮元任兵部尚书衔，有兴兵之才：打击海匪，保中国海疆平安；守护广东海防，让英国人很是无奈；是中国最早的禁烟总督（早于林则徐）；他是云贵第一军事长官，守卫南疆平安，有上将本色。阮元是文史淹通的大学者，总结清代学术成果的学术著作有“五层楼高”。阮元有惠于云南文化建设，一句“春风先到彩云南”，铸就了大美云南的风骨；他为官云南的政绩，自呈良臣风采……他真的不是庸官凡吏，更不是“笑煞孙髯翁”（昆明民谣）的丑角……云南是该有篇长一点的《阮元评传》了。

◆ 云贵总督阮元

- 002 / 离粤入滇
009 / 将军神采
024 / “平安”滇督
035 / 干练疆臣
052 / 中国最早的禁烟总督

◆ 乾嘉学派“重镇”阮元

- 066 / 从“不通”说起
076 / 编修（道光）《云南通志》
092 / 诗化彩云南
108 / 遥编《皇清经解》
117 / 在滇金石考
131 / 苍洱情深《石画记》

◆ 参考文献

第一章

云贵总督阮元

离粤入滇

公元1826年下半年的一天，道光皇帝一道圣旨，将两广总督阮元调往中国大西南任云贵总督。

封疆大使的调任，历来备受关注，于当事人、于社会各界，均颇多想法及猜测。譬如，世俗的想法是，两广和云贵哪里更为朝廷看重，哪里更为富庶？以我们现在的看法，当然是两广比云贵要强，云贵属西部省区，待开发。自然清朝也会有类似的看法，因为古代有一句俚语说“湖广熟，天下足”，意思是湖南、湖北、广东粮食丰收了，整个中国的“民之食”便丰足了。

这个看法的潜台词便是，是不是阮元在皇帝面前失宠了，贬到山高水远的云南去做官了？况且这一年阮元63岁，已属高龄为官，是不是皇帝让他在退休前在云南过渡一下后，下台得体面一点？

这些想法倒不是阮元的想法，那显然太花花肠子了。

清朝那些有官德、抱负、理想的官员信奉的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诗），意思是凡是国家需要的，不可因个人利益改变，如同文革期间，凡事我们总想到“为人民服”一样，不能老想自己有什么得失。那么，难道阮元就没有自己的想法吗？应该

是有的，因为他是一个大活人。那么，阮元想到的会是什么？我们从史料上可了解到，总督两广，是阮元为官生涯中颇为辉煌的年代，可谓顺风顺水，可谓风生水起，政务建树、外事建树、军事建树、文化建树堪称著显。史料《御制晋加太傅衔致仕大学士阮元》祭文称他“文通武达”便是证明。因此，面临调职云南，他有一个想法是真实的，那就是他实在是不想离开广东，他对这个舒展官场抱负，构建为官政绩的巨大平台是很有感情的。

查史料，他是在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年）53岁起即担任湖广总督，说起来，与广东有10年之交了。对于我们于此写的舍不得离开广东之说，阮元的儿子阮福曾在《阮元年谱》中明确记载，原话为“有不忍别粤民意。”

另外，阮元在广东是文化兴粤的一代名臣，文政之显，封疆大吏中实属罕见。他在广东建学海堂、三水行台书院，修《广东通志》都是广东文化史上的可碑之事，可称之为昌兴广东文运，开岭南学风的一代盛举。在乾嘉时代，学界认为“岭南地处偏远，相对文化学术繁荣的江南而言，它在中国历史尚属文化不发达地区。”阮元入主广东为1816年~1826年间（1816年阴历十一月十三日被授湖广总督），前面已说过可累计为10年时间。其时，他看到广东“束书不睹，不立文字之流弊”（也即不爱读书，不著书立说的毛病），在当时广东形成空疏的学风，几乎掩盖了明代广东大学者陈献章，湛若水熠射过的理学光

芒，于是他在广东大兴汉学，培养人才，使得“岭南学风为之一新，连年科名鼎盛”。嘉道年间，竟出多名广东籍状元、探花。阮元对广东跃出人才的局面很满意，写出“文运三元西粤开，几年连向粤东来”的诗句志贺。他又吟诗道：“诸君说我多桃李，五管春风见六回”（诗句均引自陈居渊先生大著焦循阮元评传第454页），说明人才一多，百姓高兴，士子满意，老师受尊崇。阮元在广东的文教座主的地位，真是“文通人和”。阮元和广东的儒生士子相处极好，他和文化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阮元这样的文化品位至醇的人，受到广东文化界的推崇，“不忍别”广东当属情理中事。一般而言，官员的行迹，逃不过文化人的记载，而劣行尤是。但广东文化界对阮元却是一片赞扬（这与阮元在云南文化界的境遇颇有不同，这将在后文提及）。广东越华书院山长刘朴石，即是一位“歌德派”人士，他曾放言称赞阮元在广东的诸多善好，云：

“我朝百九十年来，名卿宰相帅广之久于其位，而盛名足以压百蛮，明略足以训群吏，慈惠足以洽黎庶，学问足以式秀髦，威令足以整师旅，系人去思不已者，惟官保大司马阮公为最。”

（张鉴等《阮元年谱》第154页）

这段话，敬重之情，溢于言表，特被阮元之子收

录，说明，在当时，深深打动了阮元之心，使他不能忘怀广东文人对他的友善。

而阮元除了情感上不忍离开广东的原因外，还有一件实事也让他放心不下，那就有清一代的巨大文化工程《皇清经解》（又名《学海堂经解》）计书180余种尚在编辑未竣之中，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桩大事，也是确立他以实力打出清代经学大师地位的“组合拳”中的又一记历史性学术重拳，他曾为此延揽人材，苦心经营，只是工程浩大，尚未完成便要离开广东，岂能不悻悻然惦记，于心难安、难忘？

至于说阮元以63岁高龄入滇是否有贬谪之意，回答是肯定的，此事绝无。史料记载，在阮元经历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都备受皇帝器重，简直是沐浴在浩荡皇恩的春风之中。于此我们专作叙述。

乾隆皇帝是清朝最有作为的人物，识人做事均有过人之处，阮元在他手下开始步入官场的。阮元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28岁参加散馆，也即翰林院庶吉士的甄别考试时，被乾隆皇帝发现，看了阮元的试卷，这位又被称为清高宗的皇帝称“第二名阮元比第一名好，疏更好，是能作古文者。”又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二月十五日后见军机大臣时说：“阮元人明白老实，像个有福的，不意朕八旬外又得一人。”（此话可见诸《阮元年谱》）这位高宗皇帝因为发现阮元，已是得意洋洋。以后，乾隆皇帝把阮元由七品官，升三级而为四品官的

“少詹事”，又多次赏赐阮元御笔亲题轴，福字以及元代、明代名人画册、尺牍，还有端砚、茶瓯、磁盃等器物以示嘉许之意，于乾隆六十年（1795）八月二十四日下旨调任浙江学政。此年阮元三十二岁。学政，又名提督学政，督学使者，俗称学台。学政之职，大体由“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翰林等充当”，官阶有三品的、四品的、五品的不等，《清朝文献通考·职官考》认为学政“掌一省学校士风之政”。学政享受“钦差”待遇。

“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同督抚平行。”忝列高官无疑。

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皇帝，继续重用阮元，并在多个省份先后担任过学政、巡抚、总督之职，又曾任过几个部的侍郎（相当于副部长）、漕运总督。受封高官之外，我们还查到阮元受到皇帝的赏赐、接见竟有几十次之多。查史料可知，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七月阮元五十六岁入京师至十一月，皇帝召见他共“十一次”之多。道光九年（1829）阮元在京共28日，被皇帝召见十次，说明君臣关系极好。

嘉庆五年二月，皇上曾称赞阮元在浙江巡抚任上“颇能整饬、守正才优”，又说“朕心甚慰”，希望阮元“为国宣力，成一代伟人”。“一代伟人”不是一个随便可说得出口的话，但嘉庆皇帝说了，可见寄托厚望。嘉庆皇帝的这些赞语，我们可在《阮元年谱》中查到。

清朝皇帝为拉拢人心，对宠臣进行赏赐是一种十分频繁而又有趣的官场景观。阮元在这方面的经历，次数

多不说，赏赐的物品也是五花八门，我们于记载中看到阮元受道光皇帝的赏赐物即有“大荷包一对”“小刀一柄”“小漆盘一个”“湖镜一面”“铜手炉一个”“葫芦槟榔盒一个”“三镶如意一枝”“帽纬二匣”“莲头香一匣”“赐酒一玉杯”“大卷八丝缎一疋”“大卷素缎一疋”“小卷江绸一疋”……反复赏赐，品类繁多，娘气十足呵！宠重之情尽在其中。

阮元备受皇帝重视（古代称之为恩宠）的事，还有就是一次又一次地赏赐他品尝肉、山鸡、鹿肉及“祭肉”及视为最高礼遇荣耀的参加“鹿鸣”之宴。《辞海》解释“鹿鸣”是《诗·小雅》的第一篇，是贵族的宴会诗，后指帝王“（设）宴群臣嘉宾的乐歌。”清代的“鹿鸣”之宴，即皇帝在特殊重要的日子，为元老级大臣、有功大臣、皇亲国戚设置的宴会。

参加宴会及当面赏赐食肉，无疑有“口福”之乐，但若是皇帝实施“隆恩”要把肉食赏赐于远在京外的阮元，那阮元家遇到的麻烦便滑稽有趣了。大体情形是，皇帝的赏肉由太监们送到阮元在京的住处，得由阮家的人把赐肉重盐腌好、包好，再转辗千里，交到阮元手上，再于现场烹牛宰羊杀鸡掺和之，由全家分烹。其时，免不了谢主隆恩的象征性叩拜及说一些感激帝皇的颂词，那真叫名副其实地“吃政治饭”，一定不会有美食的快乐。类似笑话的皇帝赏赐阮元吃肉的事件，曾被记录在文案中。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二日，阮元的儿子接到圣